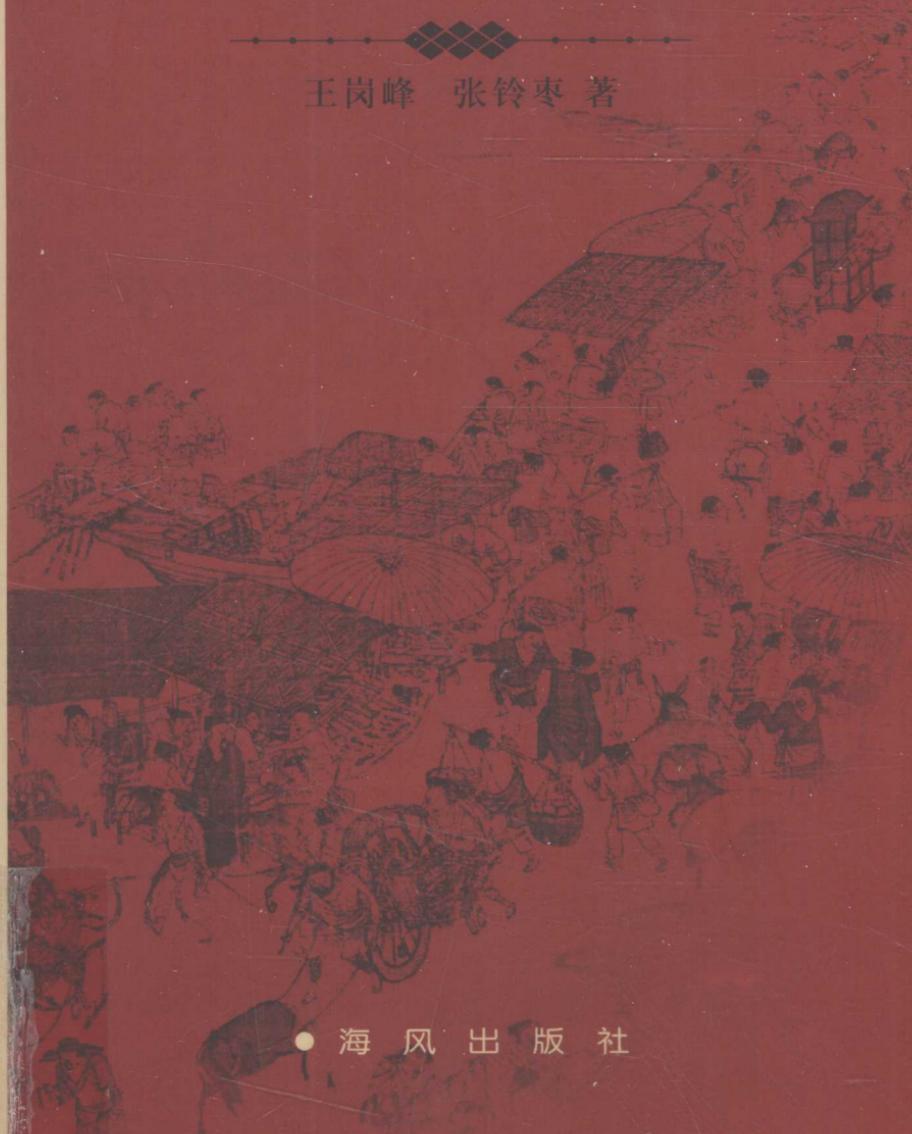


中国 伦理文化和社会发展

王岗峰 张铃枣 著



• 海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伦理文化和社会发展/王岗峰, 张铃枣著. —福州:
海风出版社, 2003.2

ISBN 7-80597-447-0

I . 中 ... II . ①王 ... ②张 ... III . 伦理学 - 研究
- 中国 IV . B82 - 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12693 号

中国伦理文化和社会发展

王岗峰 张铃枣 著

*

海风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福建福州市鼓东路 187 号)

福州市仓山彩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3 年 2 月第 1 版 200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11.375 印张 275 千字

ISBN 7-80597-447-0/C·6 定价: 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 录

绪 论.....	(1)
一、中国文化类型——伦理文化.....	(1)
二、中国伦理文化的地理环境背景.....	(9)
三、中国伦理文化的经济基础	(17)
四、中国伦理文化的社会政治基础	(25)
第一章 社会变迁和文化选择	(33)
第一节 春秋战国和百家争鸣	(33)
一、春秋战国——奴隶制向封建制的社会转型	(33)
二、百家诸子争鸣治国方略	(44)
三、变法潮流华夏	(74)
第二节 焚书坑儒和秦皇美梦	(81)
一、秦统一中国：法家思想高奏凯歌	(81)
二、秦皇独行申韩之术	(85)
三、无所不为而无所为	(90)
第三节 汉武才略与独尊儒术	(94)
一、黄老之术的无为而治	(94)
二、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创举	(98)
三、中国伦理文化格局的定型.....	(113)
第二章 社会兴盛和文化繁荣.....	(119)
第一节 汉代中兴和今古经文.....	(119)

一、强盛统一的汉帝国	(119)
二、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	(124)
三、对谶纬迷信的批判	(134)
第二节 朝代更迭和玄学释道	(138)
一、儒学失落，名教危机	(138)
二、意识形态失控和社会动乱	(146)
三、寻找精神家园——玄学、道、释	(149)
第三节 大唐盛世和儒学宽容	(177)
一、隋唐复兴、政风开明	(177)
二、有容乃大、王者风度	(181)
三、酣放茂郁、泽被天下	(190)
第三章 社会停滞和文化危机	(193)
第一节 礼治恢复和理学至尊	(193)
一、社会大动荡呼唤新伦理秩序	(193)
二、理学建构：北宋五子和南宋朱熹	(202)
三、三教合流和秩序重建	(211)
第二节 明清专制和挑战宋儒	(219)
一、文字狱和以理杀人	(219)
二、封建专制的最后辉煌	(229)
三、心学、经学和西学	(237)
第三节 鸦片战争和社会转型	(250)
一、资本萌芽和封建沦落	(250)
二、华夏沉沦：列强分割势力范围	(253)
三、太平天国的武器批判和批判武器	(257)
第四章 社会衰落和文化批判	(266)
第一节 洋务维新和西学东渐	(266)
一、器物层面批判尝试：洋务运动	(266)

二、制度层面批判尝试：维新变法	(271)
三、文化层面批判尝试：西学东渐	(276)
第二节 辛亥革命和复辟逆流	(289)
一、先行者的悲剧	(289)
二、洪宪复辟的丑剧	(297)
三、革命与复辟的文化反思	(303)
第三节 五四运动和儒学批判	(313)
一、“新青年”和新文化	(313)
二、五四狂飚和马列主义传播	(321)
三、儒家文化新路向	(328)
结束语：扬弃旧伦理文化，重建新伦理文化	(340)
主要参考文献	(354)
后记	(358)

绪 论

本世纪 80 年代以来，伴随着斯德哥尔摩国际社会学年会把文明选择的价值尺度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世界性课题，以及涉及政治、历史、社会等多学科的“韦伯热”在欧洲的兴起，绵延了 300 多年的“经验——理性”的科学主义主潮便开始退落，世界哲学的重点已经从科学哲学转向文化哲学。无独有偶，处于改革开放中的中国人，正掀起一场批判封建、“文革”遗毒，批判文化专制主义、两个“凡是”的热潮。批判的深入，必然涉及古今中外文化之争。古今问题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中西问题即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从现代化角度和以西方文化作为参照系，比“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情景，显然是视野开阔，对于中国文化的反思和其未来发展趋势的评判，有高瞻远瞩的方法论意义。

一、中国文化类型——伦理文化

我们这里论述的中国文化指中国传统文化，也指狭义的文化，指精神创造和成果。与西方的“智性文化”相比较，中国文化明显是“德性文化”。黑格尔说：“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① 这是很有道理的。在中国各种社会的思想关系中，伦理关系是决定其它关系的。伦理决定了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教育、科学、文学艺

^① [德] 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第 122 页，上海书店出版社，上海，2001 年，第 1 版。

术等。

中国古代政治法律完全伦理化。古希腊城邦林立，政治体制多种多样，为后来西方国家政体提供多种选择。有以斯巴达为代表的贵族政治，有许多城邦都曾存在过的僭主政治，有以雅典为代表的民主政体。在中国只有单一的君主专制政体，从传说中尧、舜、禹的君主雏形，到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夏、商、周三代的君主政体，就奠定了中国古代政体的单一模式的基础。君主专制政治的本质特征是：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国家一切重大事务最后都由君主一人作出裁制，而君主的裁制决断则决定于其意志、性情。中国君主的独裁、专制与中国的伦理道德观念紧密相联，君主的意志、性情如何都取决于他的善恶之心。如果君主以百姓之心为心，效法尧舜，主动地行德政于民，那么他就会受到臣民拥戴，就会国泰民安，他便被称为“明君”、“英主”。如果君主骄奢淫逸，施暴政于民，那么他就会遭国人唾弃，就是所谓的“暴君”、“昏君”。

君主以自己意志、性情统治国家，而臣民则表现为绝对服从、高度一致，这种政治秩序是由法律来强制执行，而中国的法律因政治伦理化而完全道德化了。或者说，道德法律化，道德赋予强制、外在的力量。中国传统两种最主要道德是忠和孝，这是指臣对君的义务，子对父、妻对夫以及兄弟姐妹间的义务。但这些义务的实践只是形式的，不是自由的内心情感，不是主观的自由。它们都赋予法律效力，从汉武帝开始便实施。如衡山王刘赐谋反，其太子刘爽派人到长安告发其父，但结果却以“告父王不孝”“弃市”。^① 汉宣帝诏令子隐匿父母、孙隐匿祖父母、妻隐匿丈夫都不算犯罪。三国时魏律对不孝不悌者加重惩罚，殴打兄姊

^① 《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者要判五年徒刑。晋代孝在法律中地位更加突出，子孙违犯教令，敬恭有亏，父母告子女忤逆欲杀之，官府应按父母要求执行。南北朝时，北魏法律规定：为父母服丧三年期间，出来做官者判刑五年；子孙告发父母、祖父母，判死刑。北齐更进一步定重罪十条，犯这十罪者，即使遇到大赦也不予赦免，而这十条重罪，大多属于违背忠、孝的“道德”罪。在执行各种法律时，量刑还要根据尊卑贵贱差别论重判或轻判，如皇亲国戚、勋爵高官犯罪，地方官无权判决，须报皇帝裁决，使权贵在法律上享有特殊待遇。北魏时，有爵位者和三品以上官吏，犯罪时可用爵位、官品抵当刑罚。集前代法律之大成的唐律，也有同罪不同罚的法律：尊卑长幼相犯，尊长者犯卑幼者免罪或减罪；卑幼者犯尊长者则加重罪罚。夫妻相犯、良贱相犯、主奴相犯皆如此炮法。政治法律伦理化最典型恐怕是连坐法，一人犯法，株连全家，乃至九族。所以，黑格尔说：“在中国人那里，道德义务的本身就是法律、规律、命令和规定。所以中国人既没有我们所谓法律，也没有我们所谓道德。那乃是一个国家的道德。”^①

中国古代宗教具有浓厚伦理色彩。中国常有儒、释、道三教之称，实际上，儒教虽有宗教色彩，但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儒教那种具有强烈的人世精神和深厚的人文传统，并深深地扎根于中华大地上，才使中国未曾有过其它国家和民族那样宗教全面统治的时代。相反，是中外其它企图在中国土地上生存的宗教，不得不儒教化、伦理化，与之融合，共生共荣。

道教是从古代的鬼魂崇拜发展而来，并吸收战国以来神仙方术和秦汉时期的黄老道。道教的基本信仰是“道”，它既是宇宙万物之本质，又是“灵而有性”的“神异之物”。道教的最终目

^① [德] 黑格尔著，贺麟、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125页，上海，1983年版。

标是“得道成仙”，通过修炼，使人通本还原，与道合一，不仅灵魂常在，而且肉体永生，便成为神仙。道教虽然追求永恒的逍遥自由的人生境界，但毕竟生活在现实的环境之中，依然受儒教深刻影响，深深打上伦理的烙印。如道教经典《太平经》就将儒教伦理的“三纲六纪”吸收进自己的理论体系之中，声言“三纲六纪所以能长吉者，以其守道也，不失其治故长吉”，要求人们遵守“父慈、母爱、子孝、妻顺、兄良、弟恭”^① 的伦常关系。《太平经》只是把儒教“君、父、夫”的三纲改为“君、父、师”的三纲。葛洪说：“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② 伦理道德与长生成仙思想结合起来。

佛教是当今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早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产生于公元前6—5世纪的古印度。12世纪左右，由于佛教不适应当时印度的社会需要，在印度逐渐消亡，却东渐中国，此后，中国成为世界佛教的中心。佛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由于与中国的伦理纲常发生矛盾导致剧烈的冲突。这是因为印度佛教与主张种性制度的波罗门教不同，认为“在自然律面前一切众生平等”^③。这种众生平等的理论在等级森严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其中“无君无父”与封建忠孝伦理观念发生根本性的冲突。佛教徒出家既不管父母，又不婚配传宗接代，是不孝。沙门（僧人）不敬王者，违背“君臣之序”，破坏王教一统局面，是不忠。因此，历史曾出现“三武灭佛”流血事件，三武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北周武帝在灭佛时称：“帝王即如来，

① 《太平经合校》。

② 《抱朴子·对俗》。

③ [英] 涅德尔：《印度佛教史》第150—151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宜停丈六；王公即是菩萨，省事文殊。”^① 为此，佛教不得不中国化。魏晋时期，玄学兴起，佛教学者遂以佛理附会玄学，而且在生活风貌上也模拟魏晋名士风度，养马养鹤、饮酒赋诗，俨然竹林名士、玄风翩翩。佛教学者对佛经中有关人际关系的说教根据封建伦理纲常加以调整，更积极译出颇为丰富的与“孝”有关的经典。如《佛升忉利为母说法经》、《六方礼经》、《四十二章经》、《佛说孝子经》等等。甚至还根据需要制造出新经典，如《父母恩重经》显然不是来自印度本土，而是就地取材于中国“孝”的经典《孝子经》、《孟兰盆经》而改造成的。

中国古代的教育主要是道德教育。在封建国家中，政治体制的建立、健全和巩固，始终是最重要的事情。在政府机构中做官，被视为人生道路最佳选择，学生读书就是为了做官，政府也是依其政治理念培养精英。由于政治的伦理化，因此，伦理道德教育在古代教育中是摆在首要的地位。他们从“国之本在家”的思想出发，重视家庭伦理和社会道德——孝悌忠信的教育，把个人的道德修养和提高社会道德水平看成是治国安邦的基础。他们注重气节和操守，崇高的精神境界，提倡身体力行、自强不息，强调道德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弘扬克己奉公、见利思义、精忠报国、以天下为己任的英雄精神。因此，有关伦理道德的经典四书五经是学生必读、必考的。中国古代教育虽然也不放弃知识教育，但知识主要是帮助德育的进行，智育可以为德育服务。董仲舒说：“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智而不为也。”^②

那些与德育无关的知识，由于与治国无直接关系被视为“无

① 《叙任道林辩周武帝除佛法记》，《广弘明集》卷七。

② 《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用之辨，不急之察”，被“弃而不治”。^① 直到南北朝时，南朝宋文帝在京师设四学：儒学、史学、玄学、文学，称为“四学制”，才打破了儒家一统教育的状况，到唐代，出现了律学、书学、算学、医药学、兽医学、天文学、音乐学等门类多、范围广的实科专门学校。但无论如何，把握“治人”之道的伦理道德教育内容——儒学经典是最主要的。而掌握那些非“治人”之道的知识分子待遇是非常低微的。如在唐代，医官不过正五品下阶，阴阳、卜筮、工巧、造食、天文等方面官员最高不过七品。

中国古代科学受伦理道德制约。中国古代的知识论从未与道德伦理学说明晰地区分开来。为学的目标固然主要在于探索自然奥秘，即求“真”，但中国古代更强调为了追求道德觉悟，求“善”。外在的自然界既未被当作独立的认知对象与人伦相分离，以外物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便必然遭到冷遇和压抑，难以获得充分的发展。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曾经在世界文明史上写下辉煌篇章，但当西方经过文艺复兴的洗礼，近代科技生机勃勃向前发展时，中国科技却停滞不前，大大落后了。科学技术发展意味着自由独立思想的充分发展和劳动工具、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不断更新，而中国长达二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的基础是世世代代老死不出乡里的个体小农经济和千百年沿袭不变的伦理道德传统，因此，对于任何可能导致其伦理秩序发生变革的东西都一概制止、控制，科技也不例外。那些被认为密切关系封建王朝气运兴衰的科学，如天文学就被历代统治者严格控制，禁止民间私习。唐律规定天文图私家不得拥有、也不得私习，违者判处二年徒刑。明律也有这样条文。而中国古代高品位的科技产品，高水平的技师工匠，几乎全部都为统治阶级所支配、所占

^① 《荀子·天论》。

有。一切豪华的科技产品都按官阶的高下通过政府的计划进行调节。

16—17世纪欧洲科技进步引发的工业革命，促进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深刻变革，引起社会巨大进步。而在中国，由于伦理文化的固执，反而扼杀了许多科学技术，许多重要的科学著作无人问津，以至绝版。中国古代最早的数学专著《九章算术》在世界数学史上也是极其宝贵的古典文献，但北宋以后，其术已不传，至明已无人知晓。祖冲之的数学名著《缀学》，唐代还在传习，至明代，由于“明理之儒士苴天下之实事”，“数学衰竭，是书遂亡”（徐光启语）。明末科学家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因与伦理政治无关而失传。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献给朝廷后，明神宗只批了“书留览，礼部知道”数字便束之高阁。人体解剖学在中国很难发展，这是因为人体解剖违背“正德”的宗旨，儒家伦理教条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伤毁”。

“文以载道”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典型的伦理性质。文学艺术是对社会生活本质集中的、强烈的、典型的反映。以伦理纲常为主导的中国古代人的社会生活，其文学艺术表现必然充塞其伦理精神。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具有鲜明的人文色彩和理性精神，它们反映人与自然的斗争与和谐，注重人的现世生活，其中有许多歌颂爱情、追求美好生活和反映勇于斗争、忧国忧民、积极进取等高尚精神的佳作。但是，文艺创作的目的是“美风俗，敦教化”，以文艺为教化手段的文艺功用观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最重要的观念。“治国平天下”的入世思想是大多数文学艺术家共同共目标，而“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互补的人生价值取向则是他们的共同心愿。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就积极提倡诗教、乐教，孔子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观点，把“诗”与“乐”看成是君子修身成人的重要途径。《诗》、《乐》等

成为儒家经典是因为它们具有“化性起伪”教育功能，可以“大齐天下”、“美政”、“美人”、“美俗”，起着安定社会、辅助政治、培养人才、移风易俗的作用。其它诸子的观点虽然与儒家势若水火，但他们著书立说的目的也是为了宣扬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同样体现了他们对社会生活的强烈关注。可以说，先秦诸子的“文”都是为其“道”服务的，“文”只是手段，“道”才是目的。这种传统后来被韩愈等唐宋古文学家表述为“文以载道”或“文以贯道”。

“文以载道”的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学艺术有正、负两面的深刻影响。它强调了文学艺术的教化功能，使得文学艺术家重视国家、人民的群体利益，使其作品注入政治热情、进取精神和社会使命感。如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政治抱负，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皆欢颜”的强烈爱民情感。但是，“文以载道”思想也使文学艺术家蒙上浓厚的封建伦理色彩，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治的附庸，从而削弱了其主体意识和个性自由。由于政治上官吏的选举从举荐向科举转化，以诗赋、经义取士给广大知识分子敞开了仕途的大门，古代文学家中大量是入仕当官的，都必须精于封建伦理道德的，在其作品中大量体现“忠、孝、仁、义”等思想。那些明显维护封建秩序的作品且不论，就是具有明显反叛精神的作品也无法摆脱。象《水浒传》所描写的造反英雄都具有“忠义”伦理道德观念，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歌颂反抗与宣扬忠义并行不悖。《西游记》一方面肯定孙悟空大闹天宫、蔑视统治者权威，反对不合理社会秩序的叛逆精神，另一方面又肯定他护法取经、维护既定秩序的观念。元杂剧大量表现对黑暗势力的反抗、斗争，歌颂了反压迫、争取自由的民主思想，但它往往以道德判断作为审美判断的核心参数，混杂着封建伦理说教的糟粕。连建

筑、雕塑等艺术也会体现封建的伦理思想。原来提倡平等观念的佛教，但中国化后，在其寺庙中建筑、雕塑就表现出封建的等级观念、整体的服从性。释迦牟尼佛总是居于中间，十分高大，而他的二大弟子伽叶、阿难及菩萨、罗汉形象总是比佛小。小至民居四合院，大至皇宫、圆明园、皇城，四周都有一道墙，形成一种封闭自足、不待外求、自成一统的意蕴。而群体之中都有核心部位、主次分明。等级最高、权力最大者居核心处，其余依次分配，体现出鲜明的封建伦理秩序。

二、中国伦理文化的地理环境背景

与世界上其它古老文化相比，中国文化拥有一个比较辽阔的发展空间。过去我们习惯于把黄河流域称为中华文化的摇篮，但实际上中华文化的发源地应在东亚大陆广大区间。云南元谋、陕西蓝田、北京周口店等猿人化石的发现就是明证，中华文化可追溯到一百多万年至几十万年。近几十年考古挖掘证明，不仅黄河流域，而且长江流域乃至辽河流域以及西南崇山峻岭间，也都有长达四、五千年的文明史。学术界一般将文字的发现、城市的建立和金属器具（青铜器或铁器）的制造视为“原生型”文明形成的标志。山东泰安大汶口、江苏淮安青莲岗等处发现的陶尊上刻有多种符号，其结构与甲骨文、青铜铭刻上的象形文字十分相近。大汶口文化发现说明山东半岛和淮河流域，也是夏文化的繁生之地。辽宁赤峰红山的红山文化挖掘过程，其重大成果砌石墓葬和随葬玉器，以及距今五千年之久的女神庙，说明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也曾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近些年在四川广汉发现的三星堆遗址，其大量玉器、铜器文物虽与中原同时期的器物不同，但说明长江上游也曾有过黄河流域的辉煌。

因此，中华文明发祥地不仅是黄河流域那片七、八十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和冲击平原，而应当有五百万平方公里左右的广

大区域。它腹里纵深，有很大的回旋空间。地形、地貌复杂，地势西高东低，高差悬殊，形成层层下降的三级台阶。在最高级阶梯的青藏高原（海拔4、5千米以上）东侧横断山脉高山峡谷地带，是亚洲大河黄河、长江、澜沧江发源地。青藏高原以东、以北至大兴安岭、太行山、伏牛山、雪峰山一线为第二台阶，其内部地形结构十分复杂。包括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吐鲁番盆地、四川盆地和阿拉善高原、内蒙古高原、鄂尔多斯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等。再往东是最低一级，包括海拔低于200米的东北平原、黄淮海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以及江南广大地区海拔数百米的红层丘陵盆地。再往东便是千里海岸线，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那些流淌着水的肥沃土地，适合于游牧和农耕的高原、平原、盆地，都有可能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尤其是黄河、长江流域广阔，途经千里，易于人群栖息、生养、迁徙。

由于温带气候适中，提供了良好的生产、生活条件。再加上北温带良好地形，欧亚大陆连成一片，辽阔无比，使之成为文明的发祥地和繁盛之区。正如黑格尔所说：“历史的真正舞台所以便是温带，当然是北温带，因为地球在那儿形成了一个大陆，正如希腊人所说，有着一个广阔的胸膛。”^① 中国的大部分领土处于北温带，有人类最早的文明——农业文明发展的优越气候环境。秦岭淮河以北温带区与亚寒带区相连，成为小麦、粟米为主要作物的旱地农业区；秦岭淮河以南温带区与亚热带区相连，成为稻米为主要作物的水田农业区。东部降雨量比较充沛而西部比较稀少，因而东部大部为农耕区，西部大都为畜牧区。由于地形、地貌、气候条件的复杂多样，使中华文化的发展有一种恢弘的地理环境，这是其它多数古老文明发祥地难以比拟的。

^① [德] 黑格尔：《历史哲学》第83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版。

发生于尼罗河第一瀑布（今阿斯旺）附近下游的埃及文明，其宜于农业生产的区域不超过 4 万平方公里，包括被称为“下埃及”的尼罗河三角洲地带面积约 2.4 万平方公里和“上埃及”的 1 千多公里长的狭窄河谷平原。发轫于两河流域上游的扇形山麓地带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其发展空间有限，由于受干旱威胁，人们进入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河谷，开垦两河流域中下游平原，宜于农耕的也仅几万平方公里，加上地中海东岸今叙利亚、黎巴嫩滨海地区，组成所谓的“肥沃新月带”，可比古埃及可耕面积大些。起源于克里特岛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希腊文明，其发展区域是被崇山峻岭包围各滨海小平原和爱琴海其它诸岛，形成多个面积仅数百或数千平方公里的城邦。由于负山面海，腹地狭窄，形成希腊人生活多中心和向海外拓展的态势。印度文明算是中国文明之外一个拥有较大发展地理区间，它起源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和莫恒达罗周围十余万平方公里的地区，以后又扩展到恒河流域及德干高原。但是，它在气候方面不如中国，均属于热带。而美洲、印第安诸文明，其地理范围也都有限。阿兹特克文明发展空间从墨西哥一个小岛特诺奇蒂特兰扩充到墨西哥全境和中美洲部分地区已算极限，而且辉煌不到百年。玛雅文明持续时间较长久，长达二千多年，包括墨西哥、中美洲的部分地区，总面积 32.4 万平方公里，其文明发展空间囿于高原各地和丛林。南美印卡文明是安第斯山中部地区 4000 余年文明发展的结晶，从公元 12 世纪兴起到 1572 年终结仅存 400 年左右。印卡帝国鼎盛时疆土包括今秘鲁、厄瓜多尔、玻利维亚（除东部地区）以及智利北部和阿根廷西北部，但维持不到百年。整体上印卡文化很少越出安第斯高原，主要在今秘鲁西部山地。

这些文化由于地理环境的缺陷，使得在人类历史上，多次出现因为异族入侵而导致文化中绝的悲剧。如埃及文化因亚历山大

大帝占领而希腊化，恺撒占领而罗马化，阿拉伯人移入而伊斯兰化；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因居鲁士占领而波斯化，更因阿拉伯人入侵和移入完全伊斯兰化；希腊、罗马文化因日耳曼蛮族入侵而中绝并沉睡千年；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雅利安化，所带来的种族歧视现象影响至今；阿兹特克文化因西班牙殖民势力入侵而中断自我发展；玛雅文化的中辍是因为西班牙人的入侵，还是丛林环境的恶化？这至今还是一个谜；印卡文化也是由于西班牙人入侵而拉丁化。这些与西班牙人入侵有关的文化区域都属于拉丁美洲，拉丁美洲是原西班牙人、葡萄牙和法国的美洲殖民地，其名称源于欧洲的一个种族集团——拉丁人，其文化具有拉丁文化特征。

英国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在近 6000 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 26 个文明形态，但唯有中国文化历史经数千年，持续发展至今从未中断。应该说，这与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有重要关系。历史上文化的人侵与武力的人侵往往是相伴而行的。而中国大陆有天然的地理障壁抵御外来强敌的武力入侵。古代典藉《尚书·禹贡》曾对中华民族这片栖息地作了宏观描述：“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它清楚地概括出中国东面向海，西面流沙等屏障而难以逾越的东亚大陆地理特征。

“负陆面海”是东亚大陆与欧洲大陆的共同点，但其实际内容却迥然不同。东亚大陆呈比较规则的椭圆形板块状，海洋未能深入陆地腹里，除纵深程度较浅的渤海湾外，基本上没有内海切割，这就形成十分辽阔的远离海洋的区域。即使沿海广大地区，面对那一望无涯波浪汹涌的太平洋，人们还只能“望洋兴叹”，一筹莫展。处于农业文明的强悍异族，想渡洋入侵比登天还难。而欧洲大陆则被地中海、黑海、波罗的海等内海所纵深分割，使西欧、南欧、北欧象无数半岛构成的板块，即使其腹地（如慕尼